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Zhongguojinggangshanganbuxueyuan

自学教材

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选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2008年3月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自学教材

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选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2008年3月

目 录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1

寻乌调查

(一九三〇年五月)/7

兴国调查

(一九三〇年十月)/123

东塘等处调查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179

木口村调查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8

长冈乡调查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191

才溪乡调查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233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序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现在党的农村政策,不是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全党应该执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¹⁾,应该执行即将到来的七次大会⁽²⁾的指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

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选

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调查》,一个《长冈乡调查》和一个《才溪乡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

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3],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4]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跋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

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是，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错误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5]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6]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

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少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注 解

[1]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的中央指示，是指当时所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政策》。

[2]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这项决议，并决定了七大的议事日程。这次大会曾准备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举行，后来延至一九四五年才召开。

[3]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选

[4]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5]这里所说的十年内战前期，是指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底的时期，亦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井冈山时期；中期是指一九二九年初至一九三一年秋的时期，即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至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的时期。

上文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底的时期，即自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至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期。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学习和时局》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6]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选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寻乌调查

(一九三〇年五月)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¹⁾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²⁾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一九三〇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³⁾（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⁴⁾（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⁵⁾职员，城区

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选

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6]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赢(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

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宁都小布

第一章 寻乌的政治区划

全县分为七区,七区之中包括四厢十二堡。

七区是:

城区：分东西南北四厢，为全县政治中心。

仁丰区^{〔7〕}：即篁乡堡。公平圩、菖蒲圩（即篁乡圩）为本区两个政治中心，各设一个局。

双桥区：即双桥堡。内分十三段，以留车为政治中心。

南八区：分南桥、八富两堡，以牛斗光为政治中心。

兼三区：分项山、腰古、滋溪三堡，以吉潭为政治中心。

澄江区：分寻乌、大墩、桂岭三堡，以澄江圩为政治中心。

三水区：分三标、水源两堡，以三标圩为政治中心。

明万历前寻乌还未设县，万历以后才设县。没有设县的时候，一部分属江西的安远县管辖，设置石溪堡，其地域是现在的澄江、三水、仁丰、县城等区；一部分属广东平远县管辖，其地域是现在的双桥、南八、兼三等区。

第二章 寻乌的交通

（一）水路

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源，经澄江、吉潭、石排下、车头、留车，流入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车三个圩场为最大，吉潭在三个圩中更首屈一指。

另由石排下可以通船到城区之河岭（城南十里）。

（二）陆路

以石排下为中心，分为四条大路：一条经过吉潭（三十里）、澄江

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选

(六十里)、盘古隘,通筠门岭(一百一十里),为兴国、于都、会昌通广东的大路。一条经过县城(三十里)、三标(六十里)、太阳关,通安远城(一百四十里),为信丰、安远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珠村、牛斗光(二十里)到平远之八尺(四十五里),为会昌、安远两方通梅县的大路,即会昌、安远两条路均到石排下集中,共同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车头(二十里)、留车(三十五里)、荒塘肚(六十里)到兴宁之罗浮(九十五里)、罗冈(一百二十五里),往兴宁、五华,为寻乌下惠州的大路。

另有几条小些的路:一条从澄江通安远挖补界之罗塘(三十里),再由罗塘南往下坝,北往门岭。一条从吉潭经小田、船肚、书园往平远(六十里)。一条从县城经大炉下、滋溪、剑溪、礼峯、赖地往武平(一百八十里)。一条从县城经上坪通安远南乡之胡山(六十里),再由胡山北往安远城(六十里),西往太平(三十六里)、鹅公圩(六十里)。一条由县城到新圩(六十里),再由新圩经公平圩(三里)、两广亭(四十五里),往定南之鹅公圩(八十里),再南经鹅公圩,西往定南城,西经鹤子圩往信丰。由新圩经菖蒲(二十里)、隘排口往龙川城(二百四十里)。由菖蒲、隘排口通兴宁城(一百八十里)。以上各路比较小一点。

从寻乌城出发,往门岭九十里,往武平一百八十里,往梅县二百四十里,往兴宁二百四十里,往安远一百一十里,往龙川三百一十里,往定南(经上坪、胡山、太平、鹅公圩)一百六十里。

(三)电报

过去电报局设在吉潭,民国十一年移到县城。电线由吉潭通寻乌城,通筠门岭,通平远。

（四）邮政

县城是三等邮局。一路走吉潭、澄江通门岭。一路走牛斗光通八尺，再由八尺通梅县；另由八尺分一路通平远。一路走三标通安远。澄江、吉潭、牛斗光三处有“代办所”，三标、石排下二处有“代收所”。旧历二、五、八走门岭，一、三、五、七、九走八尺，二、四、六、八、十走安远。赣州的信走安远，送于都、兴国的信走门岭。县城邮局通常可以汇款二百元以内，五百元以内须先期交涉，否则不能。前年三二五暴动^{〔8〕}，抓了邮政局长，罚过五百元。此次新局长怕抓，先期跑了。三二五暴动还杀了一个电报局长。

（五）陆路交通器具

和广东一样，不论什么道路一概没有车子。陆路运输工具大多数是活人的肩胛，其次是骡马。县城通梅县大路上骡马很多，县城通门岭、县城通吉潭两条路也有，此外没有。运输的骡马是骡多马少，但普通一概叫做“马子”。用马子驮的货物以盐豆两门为大宗。

第三章 寻乌的商业

本章目录

- (一)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 (二)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 (三)梅县到门岭的生意
- (四)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 (五)惠州来货
- (六)寻乌的出口货
- (七)寻乌的重要市场
- (八)寻乌城
 - (1)寻乌城是什么
 - (2)盐
 - (3)杂货
 - (4)油
 - (5)豆
 - (6)屠坊
 - (7)酒
 - (8)水货
 - (9)药材
 - (10)黄烟
 - (11)裁缝
 - (12)伞

- (13)木器
- (14)火店
- (15)豆腐
- (16)理发
- (17)打铁
- (18)爆竹
- (19)打首饰
- (20)打洋铁
- (21)修钟表
- (22)圩场生意
- (23)娼妓
- (24)同善社
-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一)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从石城、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几十万元。从兴国来的,茶油^⑨为大宗,米也有(少)。于都、会昌没有什么货来。

澄江圩每圩从门岭来的油约有四船(门岭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装油十二担,每担约值小洋三十元,每年以百圩计算,约值十五万元。

石城、瑞金的米到门岭,大部分经罗塘、下坝(武平属,在三省交界)、新铺(蕉岭属,离梅县三十里)往梅县,每天有约三百担过。米走寻乌通过往梅县的,很少。由寻乌通过的是油豆两大宗。豆子担数比油多一倍,每担有五斗的,有三斗的,不等。价值每斗小洋一元五毛。每圩(三天一圩)用船载的有五船,每船十四担,每担(以四斗计)值六元,每圩共值四百二十元,每年一百圩共值四万二千元。另

还有肩挑,每圩有二十担,每年有二千八百担,共值一万六千八百元。两项共值五万八千八百元。

(二)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鸡

这一条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鸡,次是牛,又次是猪。鸡的大部分是唐江、南康、信丰来的,安远也有一点,甚至有从遂川来的。走王母渡、金鸡圩、新田、版石,不入安远城,由安远城北五里地方通过,人寻乌下梅县。由梅县的鸡行装往松口,向汕头输出。鸡每天走寻乌通过的,安远来的是大宗,也还有小部分走门岭来。每天少也有一百担,多的到百三十担。每担六十斤,以每天百担计,六千斤。鸡贩子由唐江一带一直挑到梅县城或新铺圩(由寻乌走大柘去新铺下船,直往松口,不经梅县)发卖,每斤价五毛(寻乌鸡价每斤四毛)。每天六千斤,共值三千元。每年三百六十天,共值一百零八万元。梅县鸡行卖与松口,每斤价七毛以上,可谓大赚其钱。

牛

每月逢一是“牛岗”。十一月最旺,每岗七八百头牛。正、二月次之,每岗一二百头。三、四、五、六、七月最淡,每岗少的三五头,多的也不过十余头。八月初一这天为牛市“开岗”的日子,从这日起生意逐渐旺盛,每岗从四五十头到六七十头。九、十两月每岗就有百把头了。

每年共有多少牛呢?

正、二月每月平均一百头,共二百头;

三月六十头;

四、五、六、七月没有市;

八月三岗,二百五十头;